

季羨林先生与法系东方学

孙凯

【摘要】季羨林先生师承德国，却在学术滥觞上与法系东方学渊源甚深。主要原因是，在季羨林的留学时代，哥廷根大学乃至大半个德国东方学界，都在向“法比学派”靠拢。季羨林在印度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与法文文献的无碍阅读能力是分不开的。以学术取径而论，德系东方学擅长的“历史比较语文学”是季羨林最为强调的研究方法，而他在法系东方学擅长的“实证史学”方面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关键词】季羨林 东方学 法系 德系

[Résumé] Malgré ses études faites en Allemagne, Ji Xianlin a bien des affinités avec l'école française d'études orientales, d'autant plus qu'à l'époque, l'Université de Göttingen d'où il a eu son doctorat, comme la plupart du milieu orientaliste allemand, se dirigeait vers l'école Franco-Belge. Le grand succès qu'il a remporté en indologie est solidement basé sur sa capacité à lire et comprendre parfaitement les documents écrits en français. En ce qui concerne les approches scolaires, la philologie historique comparée dans laquelle excelle l'école allemande d'études orientales est la méthode la plus caractéristique chez Ji Xianlin, tandis qu'il fait également une contribution remarquable dans le positivisme historique pour lequel est connue l'école française d'études orientales.

季羨林先生是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家、语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35年至1945年，季羨林负笈德国，师从德国东方学家、佛教文献专家瓦尔德施密特，回国后创建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钱文忠在《陈寅恪与季羨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中说：

……季羨林先生受到的德国以外的影响相对较小。小而言之，从 H.Lüders(陈寅恪先生曾游学于其门下)到 E.Waldschmidt(陈寅恪先生的同学，季羨林先生的博士导师)的一系正是德国佛教语文学的正脉所在。

这番话旨在强调专攻“历史比较语文学”的季羨林和“史体语用”的陈寅恪之间的区别，单独看来并无问题，但如果考虑到国际东方学的历史大环境，恐可商榷。毫无疑问，季羨林是德国东方学在中国的嫡系传人，然而，他与法系东方学的关系却易被人忽略。孔哲将欧洲佛教研究分成三个学派，林振国在《当代欧美佛学研究方法之省察》中对“旧英德学派”和“法比学派”的论述最为清晰：

语言文献学风有其发展过程，孔哲便将本世纪前半叶的欧洲佛教研究分为(1)旧英德学派：以 T.W.Rhys Davids 与 H. 奥登伯格为代表，认为巴利佛教才是纯粹佛教；……

参见钱文忠，《季门立雪》，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2007年，第129页。

(3) 法比学派 (Franco-Belgian School), 以布桑、Jean Przyluski、希尔万·列维、戴密微与拉莫特。此学派以语言学、文献学研究为基础, 结合哲学、社会学、民族志等方法, 试图建构更为完整的佛教图像。(Conze, 1968: 1-3)

孔哲指出, 旧英德学派因太过于局限而没落,唯有法比学派独领风骚, 影响最大。.....法比学派可以说是战前欧洲佛教研究的高峰, 其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学界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源。

应该注意的是, 两学派之分立, 仅见于二十世纪上半叶, 它不过是欧洲佛教学术流变中的某一阶段。对于整个学科史, 李四龙在狄雍的基础上, 做了更加宏观而细致的划分:

我把欧美佛教研究的学术史, 从佛教研究方法论的角度, 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 19 世纪 20-70 年代: 佛教研究的起步阶段; 第二, 19 世纪 80 年代到“二战”: 佛教研究的成熟阶段; 第三, “二战”以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 佛教研究的中心转移与方法转型; 第四,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佛教研究的多元展开与方法反省。

并指出:

上述四个阶段之中, 实际上内含两次重要的方法论转型: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 是对所谓“纯粹佛教”发生了质疑, 西方已经了解到“佛一音说法, 随类各得解”这个丰富的历史多样性, 意识到若想了解所谓的“原始佛教”, 并不一定需要完全依赖南传的巴利佛典, 汉译佛典以及中亚出土的说一切有部等其他部派的经典, 同样具有相当的历史可靠性和理论权威性。

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 西方学者超出了传统的佛典文本研究, 尝试以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或民族学等方法去研究佛教的文化史或社会史.....

简言之: 二十世纪上半叶, “旧英德学派”以外的欧洲佛教学者开始重视非巴利文的佛典; 二战后, “多思路、多角度、多视野、跨学科”的“法比学派”研究方法成为欧美佛教研究的历史趋势。值得注意的是: “旧英德学派”和“法比学派”之对峙, 发生在“第二阶段”(19 世纪 80 年代到“二战”)。在两派对峙的大环境下, 季羨林所在的哥廷根大学, 显得十分特殊。“旧英德学派”的代表人物奥登伯格是“哥廷根大学”教授, 他是“纯粹佛教”的信奉者, 治史方面完全依赖巴利文献而拒绝其他。奥登伯格于 1908 年起任哥廷根大学的梵文教授, 后来这个职位被西克接替, 西克之后是瓦尔德施密特。在季羨林留学时代, 奥登伯格已经去世, 而哥廷根的其他东方学者, 却不再有只关注巴利文献的习气。可以说, 后奥登伯格时代的哥廷根大学, 经历了如李四龙指出的“第一次重要的方法论转型”, 即开始质疑“纯粹佛教”, 意识到汉译佛典及在中亚出土的其他梵/胡文经典对于了解“原始佛教”的重要性。这次转型是对奥登伯格佛教文献观的一次告别, 告别得最为彻底的, 正是奥登伯格的隔届继任者瓦尔德施密特, 以及瓦的学生季羨林。季羨林在《中古印度语言中语尾变为-o 和-u 的现象》(*Die Umwandlung -am 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 的“结论”中说:

林振国, 《多音与介入: 当代欧美佛学研究方法之省察》, 收入《正观杂志第一期》, 1997 年。为求清晰, 原文外文人名大部分换成了中译。

参见李四龙, 《欧美佛教学术史 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9 年, 第 4-5 页。

转引同上, 第 12-13 页。

我想转而讨论一下汉语的《长阿含》，可惜其印度原本已佚失……关于其语言，F.Weller 的意见是，汉译本的原型并不是用梵文编撰的。但是，迄今为止，尚未能够指明它出自哪种具体的俗语方言……Waldschmidt 曾经深入细致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这种语言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中古印度方言，和巴利文同样古老，甚至比巴利文还要古老。

季羨林经过自己的语文学论证，肯定了老师的观点，并将其进一步明确：

《长阿含》原本的语言……一定是古代的西北方言……（它）和 Lüders 定名为古代摩揭陀语、古代半摩揭陀语、古代 Saurasenī 的语言出于同等地位……

东方学界一般认为，现存最古老的佛教文献是巴利文经藏，其他语言包括混合梵文文献之出，均在巴利文献之后。然而，瓦尔德施密特认为汉译本的原文可能比巴利文还要古老，季羨林甚至把这种语言上溯到和古代摩揭陀语的同时代。这是关于“汉语佛典重要性”颇具革命性的一段宣言，同时，也是对奥登伯格“纯粹佛教观”的勇敢否定。事实上，在季羨林留学时代，哥廷根大学正在脱离“旧英德学派”，季羨林最为崇拜的学者吕德斯以及他的导师瓦尔德施密特，研究方法已与奥登伯格发生决裂，反而离“法比学派”越来越近。在那个时代，所谓的“旧英德学派”，“德系”日渐人稀，唯有“英系”苦苦支撑，二战后，更是名存实亡。关于季羨林留德十年中欧洲佛教学派格局，黄陵渝的分类似乎更加科学：

英德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全根据巴利语佛典进行佛学研究，主要从事探讨有关佛陀生平的真实性和早期佛教、佛教哲学的基本原则等基础研究。其创始人是德国学者奥登堡、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里斯-戴维斯夫妇、何纳小姐、斯泰德、德国的皮舍称、贝克、三界智高僧、塞顿杜克、史密特等、奥地利学者纽曼党派的代表作是奥登堡的《佛陀：生涯、教义、僧团》。

……

现代学派是由法国和比利时学者建立的，因此亦称法国比利时学派(Franco—Belgian School)。这一学派对南传上座部佛教和大乘北传、藏传佛教等量齐观。注重借助书面文献、口头传说、考古探察发现作为著述作品的佐证资料，并经常使用巴利、梵、汉、藏、日语佛教经典辅助写作……比利时学者拉莫特、蒲辛，法国学者莱维、富歇，德国学者瓦勒泽尔、吕德斯、瓦尔德施密特、冯·格拉泽纳普、舒曼、施林洛夫，英国学者孔兹，意大利学者杜齐都是这一学派的著名成员，其中最突出的是布桑。拉莫特的巨著《印度佛教史》至今依然被认为是该学派的第一流作品。

由此可见，主张“原始佛典说”的吕德斯、瓦尔德施密特和季羨林，虽属“德系”，却是“法比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季羨林的留学时代，哥廷根大学乃至大半个德国东方学界，都在向“法比学派”靠拢，处于佛教学术方法论的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使然，所谓“德国以外的影响”，除了泥古不化的保守派，无人可以回避。事实上，季羨林受“法系东方学”滋养颇多，且从“语言背景”及“方法论”两方面试论之。

这段译文由钱文忠翻译。参见钱文忠，《季门立雪》，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2007年，第29页。引用同上，第30-31页。

即奥登伯格。

参见黄陵渝，《欧洲佛教与研究》，收入《法音》03期，1994年。

以语言背景而言,季羨林成为国际顶尖的东方学家,与多语种文献的无碍阅读能力是分不开的。钱文忠认真统计过季羨林通晓的语言,共 12 种,分别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南斯拉夫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在这 12 种语言中,有的是留学时代的生活语言(英语、德语),有的是从事东方学研究的基础性语言(梵语、巴利语),有的是季羨林的独门绝学(吐火罗语),有的一辈子都没用上(南斯拉夫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还有一门对季羨林的治学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却向被人忽视的语言,就是法语。事实上,在季羨林的留学时代,德、法两系东方学各有所长,互相借鉴是不可避免的。季羨林博士论文【《大事 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Die Konjugation des finiten Verbums in den Gāthās des Mahāvastu*)】所依据的《大事》是关于释迦牟尼的最早神话性传记,《大事》为法国学者辛纳在 1882-1897 年间编辑而成。季羨林跟随西克教授学习吐火罗文 B,用的教材是法国学者列维的《库车(龟兹)文残卷》。1981 年,季羨林作《论释迦牟尼》,书后明确列出的三部西方参考书中,就有法系学者拉莫特的《印度佛教史》(另两部分分别是奥登伯格的《佛传》和渥德尔的《印度佛教史》)。季羨林一生谦逊,从不提及自己的法文能力,也在很多场合强调自己并非语言天才,但就季氏对列维、林藜光、拉莫特等法系学者著作的引用来看,他的法文极好,就阅读能力而言,毫不逊于当行本色的法语教师。季羨林对某些法系学者的恳切批评,均建立在对法语文献正确、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他的意见,确值得某些“猜测过于大胆、求证不够小心”的法系东方学家检讨。

以方法论而言,季羨林擅于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探讨佛教的流布与发展,同时也兼具扎实的民俗学、考古学、比较文化及考据学功底。“历史比较语文学”和“实证史学”是国际东方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欧洲学界,它们分别是德系学者和法系学者的传统优势。钱文忠评价陈寅恪和季羨林学术取径上的异同,认为陈倾法、季倾德,便是基于这种认识。不过,如果我们通读季羨林学术论集,便不难发现,他在“实证史学”方面的思考与贡献并不亚于当行本色的历史学家。不可否认,“历史比较语文学”是季羨林本人最为强调的研究方法,但仅此一项却不足以支撑他跨越诸多学科的成就。季羨林在晚年时对自己的研究范围作了一个总结,分为 14 个类别:

1 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糖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14、散文及杂文创作。

14 类中,1、2 属于“语文学”,4、5、6、7、8、9 均属于“实证史学”。以纯粹的佛教研究而言,我们且以 2007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术论集《佛教十五题》为例:在 15 篇论文中,以“历史比较语文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只有 3 篇,而“实证史学”类的文章,却有 11 篇之多。另有 1 篇题为《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

参见钱文忠,《我的老师季羨林之学生时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北京,2009 年,第 175 页。

根据季羨林的自述,他的法文学习开始于 1930 年或 1931 年的清华园时代,当时的法语老师包括美国人温德和德国人华兰德。

参见季羨林,《季羨林自述:我的学术人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8 年,第 244-245 页。

它们是:《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浮屠与佛》、《再谈“浮屠”与“佛”》。

它们是:《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论释迦牟尼》、《法显》、《中国佛教史上的〈六祖坛经〉》、《佛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形成》、《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关于玄奘》、《关于〈大唐西域记〉》、《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佛教的倒流》。

——提婆达多问题》，却是两种方法同时存在，相得益彰，值得特别说明。这篇文章试图用汉文史料重建释迦牟尼的堂兄弟提婆达多之真实史事。有两点值得注意。1、该文在总体上属于“实证史学”范畴，却在一个小问题上将“历史比较语文学”的方法暗藏其中——他把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原本残卷和巴利文、汉文的律藏比较，结果发现：汉文《十诵律》比梵文《说一切有部律》少了几句话，说明《十诵律》的译者想“为贤者讳”，掩饰提婆达多在原始佛教僧伽曾经威信极高之史实。这是德系强调的方法论在实证史学中的“牛刀小试”，极有说服力，令人钦佩。2、这篇文章对奥登伯格提出了明确批评：“奥尔登堡的《佛陀，他的生平、学说和僧团》……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超出巴利文佛典的范围。奥尔登堡……在提婆达多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水平不过如此。”我们知道，奥登伯格是“旧英德学派”的代表，排他性地依赖巴利三藏；“法比学派”则否认巴利文献的唯一性，主张用包括汉语在内的多语文献重建史事。在这篇论文里，季羨林大段引用汉文原始佛典，毫不客气地批评他的哥廷根前辈奥登伯格“没有超出巴利文佛典的范围……水平不过如此”，不啻于“法比学派”对保守的“旧英德学派”的公开质疑——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汉地《阿含经》及律藏的应用上，这位实属“法比学派”的“德系”东方学家，比以青睐汉文资料著称的法国籍和比利时籍的学者走得更远。

季羨林的学术人生立体、丰富而多元，关于其成就，王邦维的评价较为妥帖：“由语言而文献、而文学、而历史、而文化，中西皆通、亦中亦西，辞章考据，既博且精，由细微而见大节，重考据亦通义理。”正如季羨林自己所说：“我并不是因为在德国留学才成为‘德国派’的，我的无上标准就是真理。”从学术滥觞上讲，季羨林身上的德国和法国色彩同样浓重，在“历史比较语文学”和“实证史学”方面均有极大成就，究其原因，除要归功于他个人的禀赋及勤奋，也与他的留学时代息息相关。我们知道，1877年-1942年是西方佛学研究的辉煌期。在这期间，欧洲大国殖民之力在西亚、中亚、中国、印度支那等地“获取并无偿占有”大量原始资料，且德、法系学者合作紧密，欧洲东方学迅猛发展。当时，区分“德系”、“法系”也许并无多大意义——即使身在法国，也必须了解“德系”成果；身在德国，也无法避免“法系”资料。季羨林的留学时代正是这个辉煌期的末尾，可说“虽已近黄昏”，却是“夕阳无限好”。后来，随着一批重要人物的逝世（列维 1935 年、布桑 1938 年、吕德斯 1943 年），黄金时代渐渐渐远，季羨林也就成为最后一批亲炙大家芳泽、至少是得闻余香的学生。在季以后，“二战”使德、法两系东方学的交流合作不再像从前那样毫无芥蒂；“二战”后，德属、法属殖民地纷纷独立，也使欧洲学者去“东方”获取“免费资料”变得困难，甚至不再可能——国际东方学中心在战后由欧洲转向美国，与此不无关系。历史的机缘不可复制，季羨林 1945 年从哥廷根毕业，在那以后，即使再有中国学生赴法、赴德，也不太可能像他那样，处于国际东方学的学术中心，又能同时汲取德、法两方面的学术营养。在这种情况下，季羨林身兼“德、法”

该残卷由季羨林的导师瓦尔德施密特整理，名为《说一切有部律中提婆达多故事的残余》(*Reste von Devadatta-Episoden aus dem Vinaya der Sarvāstivādins*)，ZDMG, Bd. 113-Heft3, 1964.

即奥登伯格。

参见季羨林，《佛教十五题》，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8页。

参见王邦维，《梵学、印度学、东方学与中国文化研究——季羨林先生的治学范围和路径》，收入《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2010年。

参见季羨林，《季羨林自述：我的学术人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8年，第47页。

这个年代划分来自狄雍。参见李四龙，《欧美佛教学术史 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9年，第3-4页。

“学逢其时”的幸运，也适用于在1933年-1945年间留学法国的林藜光（1902年-1945年），可惜天不假年，林未能等到回国那天。林藜光是一位师承法系东方学，却几乎被人遗忘的佛教学者。他早年在厦门大学哲学系任教，与法国东方学家戴密微（Paul Damieville）成为同事，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梵文。

两系研究所所长，负笈回国，创建了北京大学东语系，显得尤为可贵。更难得的是，季羨林能虚心向学，结合汉地经典，汲取国学精华，既精考据，又通义理，综合一生成就，实已在欧洲东方学的谱系之外，搭起中国东方学的基本框架。在战后欧洲东方学辉煌日失的情况下，季羨林能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自成一派，卓然成家，既是汉地学术之光荣，也是国际东方学之幸事。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罗国祥)

1929年，林藜光在戴密微的举荐下，来到北京大学中印研究所，与胡适一起成为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 1877年-1937年）的授课口译，并与陈寅恪等人一起跟从钢和泰学习梵文、藏文佛典。1933年，林藜光赴法深造，成为法国印度学家希尔万·列维（Sylvian Lévi）及巴黎大学印度学院梵文教授勒鲁（L. Rerrou）的学生，其博士论文在比较汉、藏、梵不同文本的基础上讨论《诸法集要经》与小乘教义的关系。林藜光在法12年，勤奋工作，积劳成疾，不幸早逝，其学术成果由与他亦师亦友的戴密微整理后在法国出版（林藜光生平，可参见王启龙，《佛学家林藜光学术与生平杂考》，收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07期）。林藜光在法期间与钱钟书、杨绛夫妻过从甚密。杨绛在《我们仨》中称他“治学严谨”，钱钟书写《围城》说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与方的“不学无术”相对的正面原型系林藜光无疑。林藜光的早逝，是中国当代东方学研究之憾事，如天假以年，以欧洲学术视角从事印度学研究的学者中，师承法系的林藜光与师承德系的季羨林当可一时瑜亮。

季羨林治学严谨，也极谦虚。他在北大创建东语系时，受评教授，又兼系主任，已不需为职称发愁，求学之心却毫无懈怠。因慕汤用彤之学，季羨林去旁听他的“魏晋玄学”，认真作笔记，整整一年，一堂课也没有缺过。季羨林还去周祖谟的班上旁听“音韵学”，周比他年轻，也不是教授，季却毫不介意，晚年回忆时提及，说：“一个系主任教授随班听课，北大恐尚未有过，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能者为师。在学问上论资排辈，为我所不取。”（参见季羨林，《季羨林自述：我的学术人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8年，第64-65页）